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
(第二辑)

吴子林 主编

王 琦 著

当代西方 书写思想之环视

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左翼审美共同体思想研究”(23BZW00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共同体美学研究”(2023T160127)、
大连理工大学“星海优青”人才项目(X2021031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第二辑)

吴子林 主编

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之环视

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

•

王 琦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之环视：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 / 王琦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9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 / 吴子林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178-5677-1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63731 号

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之环视——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

DANGDAI XIFANG SHUXIE SIXIANG ZHI HUANSHI——YI RANG-LYUKE · NANXI DE YANJIU WEI ZHONGXIN

王琦著

出品人 郑英龙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熊静文

责任校对 林莉燕

封面设计 朱嘉怡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68 千

版印次 2023 年 9 月第 1 版 202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5677-1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总序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当代中国文化曾有一种“文学主义”,文学在整体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深度参与到文化之中,激动人心,滋润人心,维系人心;文学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研究随之呈现出锐意进取、多元拓展的局面,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与探索成果。进入 21 世纪,资本逻辑、技术理性、权力规则使人遁无可遁,一切被纳入一种千篇一律的“统一形式”之中,格式化、程序化的现实几乎冻结了应有的精神探索和想象力,既定的文化结构令人备感无奈甚或无为。当从“文学的时代”进入“文化的时代”后,文学在文化中的权重不断下降。在当代知识竞争格局中,文学研究囿于学科话语而一度处于被动状态,丧失了最基本的理论态度和批判意识。

当代著名作家铁凝说得好:“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①奔走在劳碌流离的命途,一切纷至沓来,千回百折,纠缠一生;顿挫、婉转、拖延、弥漫,刻画出一条浓酽的、悲欣交集的人生曲线。屏息凝听时代的脉动,真正的作家有本领把现实溶解为话语和熠熠生辉的形象,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一面,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他们讲述人性中最生动的东西,打开曾经沉默的生活,显现这个世界内在的根本秩序——一种不可触犯事物的存在。

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文艺学一直居于领军的位置,具备“预言”的功能与使命,直面现实并指向未来,深刻影响并引领着中国文学研究不断突破既有的格局。“追问乃思之虔诚。”(海德格尔语)与作家一样,当代文艺学研究者抓住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更高的心理现实”,即“知人心”),并力图用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话语释放这一核心价值,用美的规律修正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知善恶”“明是非”“辨美丑”,帮助人们消除“鄙吝之心”,向往一种高远之境。

21 世纪以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乃至整个文学活动方式持续地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嬗变;与之相应地,审美经验、媒介生态、理论思维、

① 铁凝:《代序: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隐匿的大师》,译林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6 页。

知识增量等交相迭变,人文学术思想形态发生裂变、重组,各学科既有的话语藩篱不断被拆除。“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人们深刻体认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长期连续历史的巨大文化存在,其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语言经验、话语模式需要重新发现与阐释,并且必须重新生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崭新的思想理论及其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及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实根基。

进入新时代,文艺学研究者扎根中华大地,勇立时代潮头,与时代同行,发时代先声,积极回应当代知识生产的新要求,通过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新文科观念与实践,重构当前各个知识领域的学科意识与现实眼光,有效参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孜孜于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创建,呈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贡献与话语表达,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新领域的开辟,新学科的建立,新话语的生成,需要不同见解、彼此争议的砥砺。章太炎先生当年就慨叹孙诒让的学术之所以未能彰显于世,是因为没有人反对:“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①本着真理出于争辩及促进学科发展的愿望与责任,遵循问题共享、方法共享、思想共享的学术原则,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邀请本人编选、推出“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本丛书拟分人分批结集出版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收录各人具有典范性的、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佳作,以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尽绵薄之力。

“中国当代文艺学话语建构丛书”第一辑推出了当代文艺学研究界中坚

^① 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3页。

代学者陈定家、赵勇、张永清、刘方喜、吴子林、周兴陆的6部著作，备受学界同人关注。第二辑推出的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界青年才俊的6部著作：王怀义《中国神话诗学——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王嘉军《他异与间距——西方文论与中国视野》、李圣传《人物、史案与思潮——比较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美学》、王琦《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之环视——以让-吕克·南希的研究为中心》、汪尧翀《居间美学——当代美学转型的另一种可能》和冯庆《诗与哲学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文学理论》。这些青年才俊生于20世纪80年代，师出名门，大都精通外语，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又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努力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交流、对话中，通过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新文科观念与实践，自觉构建崭新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理论话语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比较前卫、先锋，6部著作都是穷数年之功潜心撰写而成的，它们融思想与学术于一体，具有健全的历史和时间意识，并由此返归当下，呈现了崭新的理论话语、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文化逻辑，汇入了21世纪的理论创造之巨流。

行文至此，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柏格森及其生命哲学——

1884年暮春的一个黄昏，25岁的柏格森散步到克莱蒙费朗城郊。这是法兰西腹地的高原地带，漫山遍野生长着各种高大的树木。晚霞在万里长空向东边铺洒开来，远处卢瓦尔河的支流潺潺流动。柏格森站在高处，目睹河水奔流、树木摇曳、晚霞飘逝，突然对时光之逝产生了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

在与尘世隔绝的静谧与冥思苦想中，意识之流携带着一切感觉、经验，连续不断地奔涌；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结晶体内部，也就是那些凝固的知觉表面的内部，也有一股连续不断的流：“只有当我通过了它们并且回顾其痕迹时，才能说它们构成了多样的状态。当我体验到它们时，它们的组织是如此坚实，它们具有的共同生命力是如此旺盛，以至我不能说它们之中某一种状态终于何处，另一种状态始于何处。其实，它们之中没有哪一种有开始或终

结,它们全都彼此伸延。”^①

时间无边无际、缄默不语、永不静止,它匆匆流逝、奔腾而去、迅疾宁静,宛若那包容一切的大海潮汐,而我们和整个世界则如同飘忽其上的薄雾。时间之流的感觉驱动柏格森在克莱蒙费朗任教期间潜心思考时间问题,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从这部著作开始,柏格森发展了一套以“绵延”为核心概念的庞大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体系。1927年,为表彰其“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及其卓越的表现技巧”,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柏格森,并在“授奖辞”里写道:

柏格森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独自勇敢地穿过唯理主义的泥沼,开辟出了一条通道;由此通道,他打开了意识内在的大门,解放了功效无比的创造的推动力。从这一大门可以走向“活时间”的海洋,进入某种新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类精神可以重新发现自己的自主性,并看到自己的再生。^②

吴子林

2023年6月9日于北京

①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

② 柏格森:《生命与记忆——柏格森书信选》,陈圣生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序 言

书写是美学和艺术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书写既是人的身体及其行为的结果,延伸了人的视觉、触觉及动觉等诸多感官,标识着人脱离原始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又是意义得以发生的重要媒介,是人的知识、思想、观念、意识和心理等活动得以外化的重要手段,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书写始终未能成为重要的哲学概念。这自然是因为不同时期哲学需要解释的问题不同,但与书写本身的工具性地位也脱不了干系。在很大程度上,书写只是表达意义和记载意义的工具性手段,一旦完成意义的表述,书写就隐退到后场不再被关注,重要的是意义本身。再加上语音中心主义和视觉中心主义的加持,书写被排斥在哲学的边缘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解中,书写要么被排除在哲学思考之外,要么作为无关紧要的外在性工具或派生性手段,总是难以获得本体性或存在论的地位。德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下文简称德里达)使书写作为一个概念进入了哲学思想的殿堂。德里达意义上的书写永远都是一个无限敞开的过程,一个在不断延异和播撒的过程,它在留下或涂抹

痕迹中不断重写、重构、生成新的意义。它不导向意义的封闭和绝对,而是导向意义的无限敞开;它不导向意义的单一和中心,而是导向意义的复数与多元。由此,书写就被视为一种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活动,意义的延异和播撒决定了语音中心主义神话的终结,也质疑了书写的次生地位。德里达认为:踪迹才是书写的本源,它并不是绝对的;书写也绝不会确定为封闭的在场,更不会取代语音,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本源。这也正是德里达会选择书写作为抵抗语音中心主义之武器的原因。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书写的发生、过程及意义,就会发现今天的一切文明成果似乎都离不开书写。如果没有书写,文明的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书写也并不仅仅与意义的表达密切相关,它还与自身人的存在、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身体行为等紧密相连,尤其是与人类文明中异常重要的文明形式如艺术、文学等直接相关。这意味着,对书写的思考可以从多维度展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 1940—2021, 下文简称南希)以其独具特色的存在论思想,在众多的著述中对书写概念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讨论,意味深长地将书写与阐释学、存在论和现象学结合起来思考,使书写概念成为哲学思想的重要关键词,为我们重新理解书写的发生、过程、意味、蕴涵、功能等提供了极富启发的参考。

中国古典哲学对书写的思考也相对较少。但是,由中国汉字独特造型的特点催生的书法艺术,则把书写的艺术功能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中国书法美学虽然不直接讨论书写概念,但通过对中国书法作品体现出的书写姿态、汉字形态、美学风味、书法家志趣等的阐释,也发展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书法美学,其中也有非常深刻的书写思想。将中国书法美学中的书写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书写思想,尤其是与当代西方解构思潮中的书写思想结合起来讨论,或许可以更深刻地发现书写这个概念的深厚内涵,纠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中国古典哲学对书写概念的偏见。以南希的书写思想为中心,结合西方书写思想传统和中国书法美学中的书写思想,对书写与意义、书写与身体、书写与艺术、书写与文学——总括起来即书写与美学的关系进行多维度

敞开和多视角透视,也是当代西方书写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实质上是在古今中西的宏阔视野中重新激起发展书写思想的动力,建构书写概念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这也正是本书得以形成的一个内在动因。

从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将书写作为语言(尤其是语音)的派生物,其作用仅在于避免遗忘,因而书写总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在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因言称信”和“道成肉身”也显示出语音优先于书写的认识倾向。在卢梭和索绪尔的思想中,书写被理解为僭越了语音王位的替补之物。直到德里达等人开启“书写革命”,书写才被认为是真理和意义得以生发的本原。南希的书写思想就奠基在这个思想传统之上。在这条漫长而又充满嘈杂的意义寻找的哲思长河中,当代西方书写思想如何展开书写之思?如何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如何继承或发展德里达的解构之思?在德里达之后,应该如何思考书写?这种思考贡献了怎样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书写、艺术或者美学有什么启迪?这是本书展开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南希将书写发展成“外铭写”(excription/exscription),深入探讨了书写与意义、触感、身体、共在以及共同体等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关涉外展、共在、内在性、亲密性、共同体等攸关意义的话题,而且牵连身体、触感、激情、爱、倾听、死亡等攸关存在的话题。书写成了建构存在意义的根本性途径。书写之于意义的作用,就在于它始终表达意义而又使意义处于未完成状态。在每一次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书写中,身体和触感都以一种离散和打断的方式,在一切语言的破碎之中触及意义。这样,相较于德里达忽略身体维度的书写之思,南希的“外铭写”提供了触感、他者、共在等更丰富的多维向度。南希的书写之思既是在德里达的书写之上进行的,把解构之思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同时又是对德里达书写的某种超越,建立起颇具伦理意义的、以“外展”(exposition)为内容的身体存在论。总体来说,与德里达相比,南希更加注重书写的本质——意义的外展,更加强调书写意义存在的方式——共在,也更加强调书写意义生成的载体和机制——身体及触感。

南希将意义发展为包括意义、方向和感受在内的多重概念,把书写作为

重建意义世界、避免堕入虚无主义深渊的重要途径。南希的书写范畴并不仅仅指涉作为某种活动的行为,也不仅仅涉及某种文字或书面的艺术或风格,还直接与意义相关,与对意义的生存论思考相关。书写因而与我们、世界、意义三者构成了共生同构的关系。同时,南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共在”和“共同此在”概念,把存在理解为始终是“存在于一共通”之中的独一多样存在。书写就是对独一多样存在的意义的敞开,是不断朝向边界、突破域外的意义的外展、间隔和延异。共在赋予了书写浓厚的存在论色彩。在这个意义上,南希的书写之思,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论。

以意义为逻辑起点,南希把书写的本质理解为意义的共同显现。从共在概念出发,南希在我们、世界和意义之间建立起共生同构的关系,“共”成了意义乃至一切存在的根本方式。意义的生成不源自任何提前给予的预设,也排除了一切表象或意指行为中对意义优先性的强调。南希将意义的发生理解为独一多样存在如其本然地自我显现,书写就是这种共同显现的主要方式。南希用发展出的“外铭写”这个新概念来解释书写的本质。“外铭写”即意义的溢出自身,即是说,书写始终是意义起源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始终具有“向着那里到来”的未完成性。书写因此摆脱了意指或表象的限制,它始终使意义不断朝向自身之外展露,不断向着在场发生,这表明书写或意义永远不会走向终结。这种书写思想体现了南希浓郁的现实伦理关怀。

书写不只是表达或溢出意义,也能创造意义,但这是一种独特的“从无创造”。南希用无一物、无意义和创造来解释这个“无”,认为“无”标识了独一多样存在本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使意义永远面向未来敞开。在这个意义上,福楼拜的小说《圣安东的诱惑》提供了非常典型的文本证据。“从无创造”既是《圣安东的诱惑》的重要主题之一,又是南希理解书写缘起的重要论点。书写是从“无”中被“创造”的。这个高度概括的观点,说明了书写并非某种提前存在的意义的表征物,而是“凭空产生”的;书写也并非提前存在的某种工具式的存在物,而是被“创造”的,同时也是行使“创造”职能的。通过对福楼拜小说《圣安东的诱惑》的分析,南希认为,除了对空无的敞开之外,书写根本

上一无所示。因此,南希所理解的书写在本质上是意义的共同显现、“外铭写”和意义的空无敞开,是对意义的生存论解释。

在身体现象学的基础上,南希将身体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议题之一,进而发现了书写的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他认为书写本质上是对非实在性场域的打开,是对身体的触及,而且与阅读的触感化密切相关。因为书写始终发生于界限之上,在身体的触感中建构了一个意义的非实在性场域,突破和超越了内在性的绝对限制,因而它对意义的共同显现具有某种非实在性特征。同时,作为包括“感受”和“方向”含义在内的意义的共同显现,书写又始终与感受密切相关。而对南希来说,触感是更为根本的感官机制,因为它是身体得以外展的可能性条件,触感或者身体的触及构成了世界意义的起点。正是在触感的维度上,书写与阅读既处于共同存在的状态之中,又具有彼此分享和相互外展的特性。书写因而总是触感化的意义的共同显现,总具有触感化的特征。通过对书写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的思考,南希实际上凸显了书写概念中的身体维度,更深层次地深化了书写的存在论意义。

除了常见的作为艺术样式的文学书写之外,当代西方书写思想将书写宽泛地理解为一切生成意义或外展自身的行为,绘画因而也被南希理解为特殊形式的书写。就文学而言,南希将共在思想和共同体理论整合进对文学书写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文学共同体”^①首先是以神话的方式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已经彰显出神话被打断的基本事实。这不是说文学书写

① 法语中的 *communauté* 一词,英语对译为 *community*,译成中文,有“共同体”和“共同体”两种译法。南希的中文译者夏可君曾详细说明翻译这个术语的困难(见让·吕克·南希:《非功效的共同体》,《解构的共同体》,夏可君编校,郭建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译为“共同体”强调其作为建立在同一性或本质化基础上的“同”,而译为“共同体”则强调其并非封闭而与他者相通的“通”。汉语中做出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南希更多是在后一种“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但他对这个词的使用是建立在对传统那种以“同”为本质的建构的批判基础上的。因此,本文同时使用“共同体”和“共同体”两个汉语词来对译 *communauté*:在需要强调它对本质化、实体化、同一性等的要求时,采用“共同体”的译名;而在需要突出它去同一化、“解辖域化”、非本质化等特性时,则采用“共同体”的译名。

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文学共同体”只能以一种“非功效”的方式进行运作,文学书写只能在共通或共在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南希用“文学的共同体主义”这个概念分析了文学与政治之间既共在又分联的关系。

南希还将书写作为意义的共同显现的思想,用在了对基督教绘画的分析之中。在他的理解中,绘画作为留下痕迹的行为和表达意义的载体,是一种凝结着身体触感的“外铭写”,即意义向自身之外的溢出。在绘画这种触感化书写中,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内在性之中向一个“在外的彼在”无限地外展,也就是南希所理解的基督教绘画的真理。在对“这里是我的身体”和“不要触摸我”等基督教关于身体的理念的分析中,南希在文学书写和绘画书写之间建立起比对关系,认为绘画书写的意义在于意义空间的自行敞开。南希还发现,书写范畴可以实现对艺术的多样性、碎片化乃至崇高概念等基本命题的重构,为我们重识艺术自主性和艺术终结论提供了新的启示。

作为当代西方书写思想的重要一环,南希的书写思想首先是建立在他者和关系维度上的,与它相关的共在、身体、外铭写、触感或共同体等概念,都强调朝向外部的无限敞开,以外展、沟通和分享为基本特征。这决定了南希的书写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生存论思想。南希的书写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同一化、本质主义的批判,对共在、独一性、外展、分享等概念的强调,以及对他者维度的重视,等等,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可以推动生态美学、生态文论、生态批评的建设和发展。南希对书写的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的揭示,敞开了书写作为意义的共同显现的无尽可能性,使我们可以从意义和身体的角度,重新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的书写话语体系。但是,将共在、分享、触感、身体乃至西方话语的普遍主义倾向等维度融入书写范畴之中,在扩大书写话语的致思范围、将书写提升至生存论高度的同时,也有将书写范畴泛化或乌托邦化,使书写范畴脱离日常经验的理论缺陷。

作为哲学之重要一翼的美学理论,也必须回应哲学提出的意义、书写、身体、触感等问题,这是当代书写理论不可回避的论题。从美学史的角度看,意义与触感、身体与表现诸问题,乃是美学的基本问题。环视当代西方书写思

想,可以发现,不论是在西方思想语境中,还是在中国艺术语境中,书写都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和艺术的话题。南希的书写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性意义。也就是说,南希的书写思想可以成为中西书写理论建设走向交往和对话乃至相互补充和修正的重要平台,可以成为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尤其是中国特色书写话语体系的重要参考。简言之,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书写文化传统和不断丰富变化的西方理论资源来说,展开理论间的交往和对话就意味着发现更多理论背后的张力,开启更多未知领域和可能性,在思维方式与书写理论的领域开拓出更加深广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南希的书写思想又是我们展开理论交往和对话无法绕开的对象,是我们建构自身文论话语的重要借鉴。

在后理论语境中,只有将书写与意义、书写与身体、书写与艺术、书写与文学等关系全方位地展开,在书写与美学的关系中重新敞开书写概念的理论内涵,才能将书写思想延展开去。对于当代西方书写思想,重要的也许不是去反思和辩驳,而是在思想在地化的过程中,重新唤醒思考自身传统的可能,重新敞开思想的未来。正如《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的作者亚瑟·布雷德利所言,《论文字学》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不可穷尽的”,“总是存在着更多需要去讨论的东西,存在着更多需要思考的东西,存在着更多需要去阅读的东西”;因此,对德里达来说,“阅读、阐释和洞察的过程是无限地朝着他者、差异、未来的可能性开放的”。^①对书写的阅读、阐释和洞察,也是如此。它不提供一个一劳永逸或持久有效的结论,而是召唤一种新的、更具挑战意味的讨论方式、思考方式和阅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于书写概念的多维度讨论又并非以当代西方书写思想本身为结论,它不是封闭的,而是无限敞开的。思想所要求的首先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敞开;所要求的也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倾听。

^① 亚瑟·布雷德利:《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孔锐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

说 明

1. 凡文中出现的特殊专有名词,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给出相应的原文,并以“()”标记,当同时给出多种外文时,不同外文间用“/”区隔。

2. 凡文中所引外文著作,已有中译本的以中译本为主要参考,同时尽量参照原文进行核对;还未有中译本而有英译本的著述,参照法文原著和英文译本进行对读,再译为中文。个别外文翻译,由于理解不同,往往有不同译法。在诸种不同译法中,笔者只能采用一种。为照顾译名统一和行文顺畅,笔者在引用相关著作中译本时,会对一些译名做出微调,改动之处皆由笔者负责。引用未有中译本的著述时,在注释中列出法文原文或英文译文出处,供读者参考。

目 录

第一辑 书写与意义

第一章 从替补到延异：书写思想的传统__003

第一节 传统形而上学中语音对书写的贬抑__004

第二节 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__008

第二章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论：书写思想的逻辑起点__018

第一节 意义作为思想的基本问题__018

第二节 从“哲学的终结”到意义的“悬置”__024

第三节 从意义的有限性到意义的实在性__028

第四节 意义论的文论敞开与再构__033

第三章 “外铭写”：意义论视域中的书写概念__038

第一节 从“悬置”到“外铭写”：书写中意义的原初敞开__039

第二节 身体的触感与铭写：书写意义的深度生成__049

第三节 超验之物的形而上学：“外铭写”与意义的未完成性__055

第四节 意义走向域外：书写理论的中国叙事__063

小 结__066